

## 清代清水江流域木材交易繁盛的原因分析

谢小芹

(西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贵州省清水江流域的林业发展史是一部值得研究的历史,这里曾创造出辉煌的木商文化,被誉为木材贸易的黄金时代。该流域的木材贸易自宋元开始,盛行于明清,延续至民国,有五百年历史。与以往朝代不同,清代该流域木材交易量曾创历史新高,其背后的原因,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本文认为这跟良好的地域环境、清王朝对疆土的深度拓展、区域性木材市场网络的形成、人口急剧增长背景下地方族群的另类生计模式及王朝政策和土办法的共管共治这五大因素相关。

**【关键词】**清朝;清水江流域;木材交易;原因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4-0071-09

## On Reasons of the Timber Trade Flourishing in the Qing River Basin in Qing Dynasty

XIE Xiao-qi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y, Chengdu 611130)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forestry development in the Qing river basin of Guizhou province is a history worthy of study, which had created a glorious history of wood business and also is known as the golden age of timber trade. The basin's timber trade with five hundred years history rised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flourish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ntinued the Republic of China.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dynasties, the trading volume of the time in the Qing Dynasty has been the highest record, it is worth to study the topic about exploring the reasons. The paper considers this with five factors related: goo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terri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timber market network, looking for alternative livelihoods mode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and co-management governance between the dynasty policy and native solution.

**Key words:** Qing Dynasty; the Qing riverbasin; wood trade; reason

“清水江林业发展史是一部值得回顾的历史,被史学家誉为清水江的‘木材时代’”<sup>①</sup>。清水江流域<sup>②</sup>流经贵州省东南部(图一),据清代贵州巡抚爱必达《黔南识略·黎平府》记载,“清江在都匀县境,俗名

[收稿日期] 2016-06-17

[项目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精准扶贫视域下西南民族旅游地区贫困再生产及治理机制研究(16YJC840026);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阶层分化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研究”(15CKS022)

[作者简介] 谢小芹(1986—),女,管理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与基层治理。

① 单洪根:《木材时代——清水江林业史话》,中国林业出版社,2008年,第199页。

② 清水江俗称苗江或苗河,是贵州省第二大江,源出贵州省中部苗岭山脉,属湖南沅江上游干流,流经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都匀(市)、丹寨、福泉、麻江、雷山、凯里(市)、黄平、施秉、台江、剑河、三穗、黎平、锦屏、天柱等15个县(市),注入洞庭湖,通长江下游各省。

‘长河’,又名‘剑河’,亦曰‘马尾河’,在八寨厅(今贵州丹寨县)境名‘鸡贾河’,在麻哈州(今贵州麻江县)境名‘平定河’,在清平县(今贵州凯里市)境名‘凯里河’,入清江厅(今贵州剑河县)界始名‘清江’,至湖南黔阳县始有沅水之名。源出府(都匀府)城东北诸山涧中,绕城西南,合流迳府属、镇远、黎平诸府界,出黔阳”<sup>①</sup>。

该区域是一个典型的山区社会,歉于田而丰于山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丰富的林木资源,并为木材交易提供了天然优势,这里历来是我国南方主要木材供应地和重点产区,“往昔本省森林,向极盛密。……各林区以水运及市场限制,昔日木材可大量外销者,亦仅限于清水江、榕江及赤水河三大流域。尤以清水江为最重要,约占十分之五”<sup>②</sup>。“苗江木,天下无”,清水江流域不仅木材繁多,而且还创造出辉煌的木商文化。自宋元到民国,该流域的木材贸易持续了五百年左右,在清时代,木材的输出贸易量达到顶峰。

本文主要考究清时代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不断发展及繁荣的原因,认为这跟良好的地域环境、清朝对苗疆的深度拓展、木材区域性市场网络的形成、人口急剧增加背景下地方族群的生计策略及王朝政策和土办法共管共治的这五大因素相关。本文尝试从以上五个方面对清时代清水江流域林业贸易兴盛的原因进行逐一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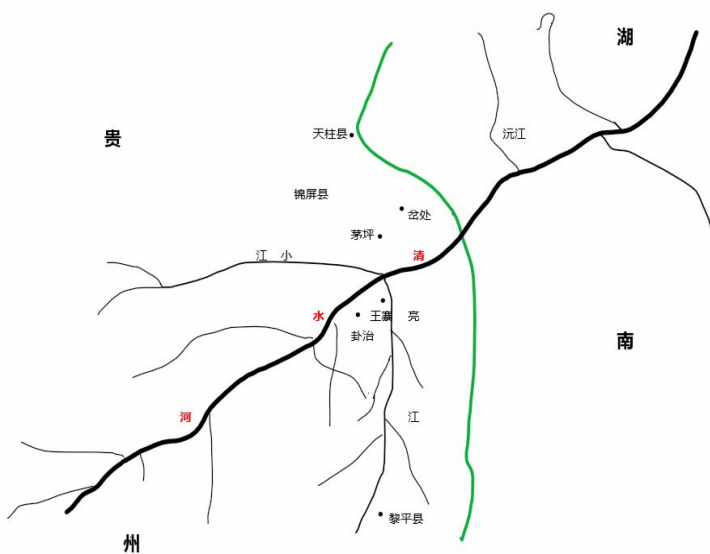


图1 清水江流域的水系分布图

## 一、良好的地域环境

木材市场的形成离不开大面积林木的种植与良好的运输条件,这是基础,清水江流域具备了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该流域流经的地方主要是一片宜林不宜农的山地地带,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盛产杉、松、楠等。该流域特殊的地貌、气候、土壤和河流等自然条件孕育出优质的木材,尤其是杉木,大多高大笔直、纹理细致、入土不腐,“干端直,大者数围,高七八丈,纹理条直,有赤白二种,赤杉实而多油,入土不腐,作棺不生白蚁”<sup>③</sup>。良好的地域环境是木材交易市场兴盛的前提。

在地形地貌方面,清水江流域平均海拔 1000 米左右,“流域内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境内最高海拔 2179 m,最低海拔 137m”<sup>④</sup>。山高坡陡,山谷纵横,生态环境复杂,自然区域环境较为封闭,这为林业的发展提供了地理上的极佳优势。在气候方面,“黔虽僻处,而气候转多适中之处。虽酷暑,不过晌午挥扇,早晚则仍夹绵也;虽湿寒,而重裘□火之时少,冰坚淞挂无有也”<sup>⑤</sup>,这里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① [清]爱必达:《黔南识略》,杜文铎点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6页。

② 贵州省编辑组:《侗族社会历史调查》,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8页。

③ [清]爱必达:《黔南识略》,第80页。

④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林业及林业产业现状调查》,载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苗族卷》,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365页。

⑤ 胡章:《(乾隆)清江志·天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集》,巴蜀书社,2006年,第366页。

降雨量大、气温适中和光照弱等气候特性比较合适杉木和楠木等的生长,这些树木的生长速度较其他地方快,十八年可成。在土壤方面,该流域的土壤大多属于黄质和红质土壤,土层较厚,土壤松软且湿润,含丰富的有机物,如氮磷钾,这利于树木的生长。在交通方面,清水江作为一条天然的水路交通,与临近湖南的沅江相联,进而可达长江中下游,可以很便利且低成本的将大批木材输送出去。清雍正中期,贵州巡抚张广泗等开始疏通该流域,“旧时陷苗境,道塞。雍正七年鄂文端与巡抚张广泗开浚,自都匀起至楚之黔阳止,凡一千二十余里,于是复有舟楫之利”<sup>①</sup>。“江湖平定,木可通行”,如果没有清水江这一天然的黄金水道,“舟楫往来”和“木筏蔽江”的盛景也就很难看到,清水江流域以木材流动为中心的市场网络的形成也会受阻。

在地方志书中,对该流域大规模林木的种植已多有记载,(光绪)《天柱县志》记载,“地接黎阳,遍地杉山,土产以木植为大宗”<sup>②</sup>。(光绪)《黎平府志》记载,“府属及清江、台拱等处俱产杉木周围约计千余里”<sup>③</sup>。《剑河县志》记载,“黔山多童,先民不习松杉等利,山中之树听其长养,竟多不知其名者”<sup>④</sup>。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出规模大且质地优良的林木,再加上优越的水运通道,这为木材贸易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地域基础。

## 二、王朝对苗疆腹地的深度拓展,“苗木”升级为“皇木”

清水江地区的木材由普通的“民木”升级为“皇木”,这是木材贸易兴盛的一个最为至关重要的因素。元明清皆定都于北京,都城的修建需要大量木材且对木材材质要求较高,清水江特殊地域环境孕育出质量上乘的木材成为首选,“清水江流域出产的木材,放在水里,千年不烂,置于干处,千年不烂。等到腐朽时,是从外表烂起,决不先烂心,容易被发觉,可以修补”<sup>⑤</sup>。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清水江林业的贸易,尤其是在明清时期,“锦屏、天柱以及黔东南所产之杉木,已成为远销省外的重要商品。从清代锦屏每年木材交易金额达数百万两白银”<sup>⑥</sup>。

早在宋元时期,清水江的木材贸易就开始萌芽,这时候也出现了部分族群开始迁入清水江下游的村寨开展木材买卖活动,宋人范成大有云,“黔桂山地之名,常以山货,杉板等与民博易盐米”<sup>⑦</sup>。然而,宋元时期的木材并未进行大规模的开采,直到明清。“明清两代王朝都致力于帝国西部疆域拓展,在西南部地区主要集中于滇黔的经营”<sup>⑧</sup>,明代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清水江流域锦屏地区的林宽因不满明王朝的民族压迫而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反抗运动,随即遭到镇压,也在这时,中央政府便得知了清水江流域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的信息。此后,清水江流域便成为明朝征集皇木修建皇宫殿堂的首要供应点,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是中央最早在贵州征派皇木的开端,“工部以修乾清、坤宁宫,任刘丙为工部侍郎兼右都御史,总督四川、湖广、贵州等处采取大木”<sup>⑨</sup>。流域内优质的杉木和楠木等开始大规模的作为皇木伐往中原,木材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自明代开始,清水江的木材就由“民(苗)木”升

① [清]吴振棫:《黔语》卷上《开通清江之利》,第5页,《黔南丛书》第二集第十册。

② 杨树琪:《光绪续修天柱县志·食货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2册,巴蜀书社,2006年,第208页。

③ 陈瑜:《黎平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集》,巴蜀书社,2006年,第204页。

④ [民国]《剑河县志》卷1《天文志·气候》,《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2册,第515页。

⑤ 傅安辉:《谈再造侗乡的林海》,《凯里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⑥ 徐晓光:《清水江流域林业经济法制的历史回溯》,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⑦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民族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4页。

⑧ 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三联书店,2006年,第18页。

⑨ 《明实录·武宗正德实录》卷117。

级为“皇木”或“贡木”<sup>①</sup>,用于修缮宫闱、陵寝、神坛、园林和亭台等。明代清水江楠木“大者备官家之采,其小者土商用以开板造船,载负吴中拆开船板,吴中拆取以为他物料,……近吴中器具皆用之”<sup>②</sup>。然而,这时候的清水江广大地区仍为地方土著所控制,属于生苗,也即“化外”之民。那么,何为“化外”呢?“所谓的‘化内’,就是纳税的、有文明的、有户口的这些人构成的,而所谓‘化外’,指的与纳税的、有文明的、有户口的这些人相区分的,外在于‘教化’的人”<sup>③</sup>。明时代的苗侗仍属于“化外”之民,并未被中央直接统治。清雍正时期,清王朝对黔东南“苗疆”实施更大规模和更加深度的开发和拓展,云贵总督鄂尔泰和贵州巡抚张广泗开始在这一带实施深度拓殖和改土归流,最后将这一区域纳入清王朝的直接统治下。自此,清水江流域的族群由“化外”走向了“化内”,纳粮附籍,正式纳入到王朝的统治体系中。“王化”的过程也伴随着大量的木材交易,清王朝对木材的需求更大,向清水江购买木材的量也达到顶峰,这时候的“皇木”也称为“贡木”。皇木采办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临时性的皇木采办,以巨大的楠和杉为主,如临时修建宫闱等。二是例木,指的是各省每年定额的竹木采办,以中小杉木为主。清代民间文献可以证明该流域确为皇木出产之地:一是《清代佚名商编路程抄本》,明确地记载了卦治至托口的水路程<sup>④</sup>;二是《采运皇木案牍》,记载了“乾隆四十二年湖南省例木的主要采办地点为湖南常德、托口和贵州‘三寨’”,且明确记载“楚南解京例木,在贵治之毛坪、王寨、卦治等产木地方竖旗采办,久经通行在案”<sup>⑤</sup>等。嘉庆年间,木材贸易规模达到鼎盛,木材地位的飙升促进了木材贸易的极大发展。

自明时代起,清水江似乎被贴上了一道特殊的政治识别标记,即只有该地域内出产的木材最好。在清朝时,边疆的深度拓殖和化内之策使得该流域内的木材贸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木材交易量达至顶峰。总之,“皇木”身份的确立在最大程度上奠定了该流域内木材的较高地位,确保了持续 500 年的交易历史。

### 三、木材区域性市场的发展

明之前,清水江的木材市场发育较为迟缓,自明开始,随着王朝势力逐步向西南地区的大幅度介入,民间商业资本不断流入,地方木材市场开始激活并得到发展,木材贸易的区域从清水江中下游迅速扩展到中上游和各支流,清水江流域的木材借清水江进入长江干流运往江南,逐渐进入到全国性的木材市场中。皇家修缮宫廷、豪门贵族建府署、园林别墅和制造高档家具、各个地区的城市建设尤其是江南地方城镇的发展和人口增加所需大量木料以及沿海各地造船等形成了一个强劲需求的木材消费市场,由于林木资源禀赋较好,清水江木材被视为一个绝佳的木材库。这里木商云集,穿梭于道,成为享誉全国的木材市场。在交易中,木材中间人和代理人出现了,全国各地的大小木商纷纷云集,“络绎于道”、“舟船往来”、“木贸遍地”,木材市场相当活跃,“(黎平)内自清江以下至茅坪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阴,栋梁之材,弥不备具。坎坎之声,铿訇空谷,商贾络绎于道,编巨筏放之于大江,转运于江淮间者产于此也”<sup>⑥</sup>。围绕木材种植和贸易形成了“上游的山客—卦治、王寨、茅坪的三寨当江主

① 民间社会中对由地方政府采办后送往京城的木材称之为皇木,即朝廷皇家所用的木料。

② 《安澜公馆碑记》。

③ James C.Scott(詹姆斯·斯科特):《文明缘何难上山》,2012-10-04,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④ 王振忠:《徽、临商帮与清水江的木材贸易及其相关问题——清代佚名商编路程抄本之整理与研究》,载张新民:《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4年。

⑤ [日]相原佳之:《清代贵州东南部的林业经营与白银流通》,载张新民:《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4年。

⑥ [清]爱必达:《黔南识略》,第177-178页。

家(掮客)—三帮和五勤等水客”三位一体的基本市场秩序。区域性市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保证了木材贸易活动的有序进行。

山客,也叫山贩,是卖方,多来自山间,“山客常用包袱带钱游走山间购木,故又称他们为‘包袱客’”<sup>①</sup>。山客主要指的是从事树木种植,木材砍伐和运输的人,大多是当地的苗族人和侗族人,由于他们常常在中上游活动,因此,他们也被称之为上河客。此外,也有少量从湖南等地沿江而上靠佃山栽杉为生的人。山客将树木砍伐,运到三寨(王寨、茅坪、卦治),然后再经其与行户和水客三方当面议价和交易。

掮客,也称为木行或主家,指的是促成木材交易并从中获得佣钱的中间人,这里主要指轮流值年的锦屏县内的茅坪、卦治和王寨的“苗民”,他们长期与外来木商交往,既能讲汉语,也能讲方言,成为外来商人与本地人的中间商。然而他们不是一般的中间商,而是享有一种能够控制木材交易的能力,拥有“一口喊断千金价”的特权。如三寨中的姚百万、姚玉坤父子和李三千等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木商资本家,“姚百万,李三千,姜家占了大半边”<sup>②</sup>。清初,设有当江制度,即负责并经营木材交易,“三寨轮流轮值之年,谓之当江”<sup>③</sup>,三寨位于清水江及其支流的小江和亮江,故称“三江木行”,具体而言,“清廷在王寨设总木市,在茅坪、卦治设立木市,正式规定在王寨、茅坪、卦治三地开设木行,经布政使司审批获得木行资格后方可经营木行,其他人不得擅自经营。三寨取得了法定当江的垄断资格,同时,规定三寨依次轮流值年当江,轮一寨当江时,只准该当江口岸木行从事林木交易,其二寨的木行不得私引客商买卖”<sup>④</sup>。山客和下面要分析的水客只能在三江进行木材交易,三寨轮值当江的垄断资格一直受到官府的保护。

水客是买家,来自下江各地,被称之为水客、买客或下河客。由于清水江木材交易的发展,该流域之外的人也纷纷携资来购木,他们通过行户与山客进行贸易交往。水客分为官商和民商,前者也称“皇商”,指的是朝廷委派专门的采购木材官员,而后者指的是江淮等地的民间商人,如徽商的汪溶,“家贫,佣于木商。跋涉江湖,远及苗洞”<sup>⑤</sup>。清康熙年间,民商开始结帮到流域下游购买木材,但这时候的民商还只是散商或零商,并未形成帮派。光绪初,木材贸易极度繁荣,木商由散商升级为一种有较强组织架构的帮派,即商帮,势力强大的有“三帮”<sup>⑥</sup>、“五勤”<sup>⑦</sup>和十八帮<sup>⑧</sup>。三帮和五勤能够直接进入内江地方购买木材,而十八帮等其他客商只能通过投驻外江,让其他木商代为购买。

围绕木材贸易,山客、行户和水客之间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贸易链条,区域性木材市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为清水江木材交易提供了强大的市场动力,成为清时代清水江木材贸易繁盛的重要因素。

#### 四、人工林的大规模种植

清水江流域是苗族和侗族世居之地,山区人民以山为生,经营林业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明清时期,

① 锦屏县林业志编纂委员会:《锦屏县林业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1页。

② 贵州省编辑组:《侗族社会历史调查》,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③ 光绪《黎平府志》卷3上《食货志》,第32页。

④ 锦屏县林业志编纂委员会:《锦屏县林业志》,第523-524页。

⑤ 《婺源县志采辑·义行》。

⑥ 安徽的“徽帮”、江西临江的“临帮”和陕西西安的“西帮”。

⑦ 即湖南常德府、德山、河佛、洪江、托口。

⑧ 即湘鄂等省木商的统称,即汉口帮、汉阳帮、大冶帮、黄冈帮、长沙帮、衡州帮、益阳帮、宝庆帮、邵阳帮、永州帮、辰州帮、沅州帮、德山帮、常州帮、宿松帮、闵帮、金寿帮和花帮。



随着木材需求量的不断增加,自然生长的林木难以满足“拔大毛”式的木材需求市场,这使得部分地方的木材因采伐量过大而逐渐枯竭,《明实录》载“贵州山林空竭,海内灾伤,材木料价采征甚难”<sup>①</sup>。再加上人口大量增加,地方社会不得不寻找新的生计方式。将人工林作为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这是一种较好的谋生方式。明朝中后期,当地人便开始了种植人工林的历史,文斗寨的《姜氏家谱》有姜氏先祖记载的专门种植林木的历史,“万历中,开坎砌田,挖山种杉”<sup>②</sup>。《三营记》也有记载,“(明时)众兵丁散落四境,各相掘地垦田,专以挖山栽杉为业”<sup>③</sup>。人工林的大面积种植就较好的规避了自然林缓慢生长带来的森林资源枯竭和由此导致的木材贸易中断的风险,为长期、稳定的木材供应和交易市场的持久繁荣提供了可能性。

由于外地对木材的需求量很大,木材的砍伐速度很快,在明朝末年,靠近江边的木材几乎被砍伐殆尽,这时候,当地人便开始了人工造林,这就拉开了清水江流域人工造林的辉煌历史。到清时期,清水江两岸的高山峡谷中,到处都是人工栽种的树木,主要以杉木和松木为主。地方族群拥有一套完整而有效的种植技术和模式,这是苗侗人民在长期种植过程中积累的智慧和经验,从播种到管理环节,包括植树造林、混交林模式及林粮间作等。用人工的方式来控制树木的演替,积极培育优质速生丰产的森林资源,弥补了天然林资源的不足。

在树木栽培技术方面,少数民族创造了“人工育林”的新技术,使得“人工林”得到大面积的发展。技术也从一个不断发展到日趋成熟的过程,“在‘人工育林’技术中,最早的‘秧苗’培植和栽种是插条造林的无性栽培,后来改为有性繁殖,即生苗造林”<sup>④</sup>。生苗造林技术使得苗木成活率更高,种植面积更大。在管理环节实施封山育林,“‘人工育林’的经济技术包括开荒、辟地(破土、整土)、选种育秧、移栽、林粮间作、抚育间伐、护林防火、集中采伐、运输销售八个步骤”<sup>⑤</sup>。选种时,“杉阅十五六年,始有子,择其枝叶向上者,撷其子,乃为良,裂口坠地者弃之,择木以慎其选也。春至则选粪土,覆以乱草,既干后而焚之,而后撒子于面上护以松枝厚其气,以御其芽也”<sup>⑥</sup>。新型栽培和管理技术的出现极大的提高了树木的产量,同时也确保了树木的优质。光绪六年(1881)至宣统元年(1908)“黎平等地的侗族个人造林不下数十万亩”<sup>⑦</sup>。(嘉庆)《百苗图》载,清水江两岸居民“广种树木。与汉人通商往来,称曰‘同年’,清水江黑仲家<sup>⑧</sup>。在混交林方面,当地人在营造杉木林时还按15%的比率种植其它树种,如杨梅、清柑、樟树、油茶树、漆树等。杉楠木被砍伐后,这些杂生树种一般都不加采伐,而是任其生长,这样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些杂树的籽实可以给越冬的鸟提供较为丰厚的粮食,这样就可以保障危害树木的害虫有足够的天敌。二是,多样种植模式能够让不同生物生长,可以较好的抑制杉楠木的病菌滋生。此外,在种林过程中,地方人采取了林粮间作的智慧做法,即种植新树的头几年内(一般是三年)可一起种玉米和茶油等。锦屏县的林粮稻作如下,“春砍草木,烧灰作肥,四月垦地,种植小米,秋后翻地过冬,

① 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要》,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58页。

② 杨有赓:《“姜氏家谱”反映的明清时期文斗苗族地区经济文化状况》,贵州民族调查之六,贵州省民族研究所,1998年,第347页。

③ 姜海闻:《(光绪十九年)三营记》,贵州档案史料,贵州省档案馆,2001年,第78页。

④ 刘宗碧:《必须妥善处理生态目标与生计需要之间的关系——关于黔东南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的问题之一》,《生态经济》2010年第5期。

⑤ 刘宗碧:《清水江流域“人工林”的资源禀赋和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初探》,《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⑥ 鄂尔泰等:《乾隆》《贵州通志》(1714年),靖道谟、杜淦撰,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⑦ 李汉林:《百苗图》校释,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5页。

⑧ 黑仲家主要指的是居住在清水江的侗族居民。

来年初春碎土征地,准备栽杉;栽树后,于林地苗行间,间种包谷两季,注意勿使包谷须根伸入杉苗窝中,秋收包谷后,将茎叶积于杉苗上侧,腐烂为肥;树苗生长两年后,高可达四五尺,不再种粮”<sup>①</sup>。种林含粮,种粮抚林,林粮兼营且大面积连片经营所塑造出的人工环境有利于林木的最大化生长。

因此,在长期种林过程中积累的“人工育林”、混交林和林粮间作的经验就避免了自然林带来的自然和社会风险,确保了木材能够源源不断的供应,调和了采育失调,从而为木材交易市场提供了一条较为持久的补给线。

## 五、王朝政策和土办法的共管

木材市场的繁荣还离不开一些制度和规则,不仅包括国家正式的规章制度和政策法令的王朝政策,还包括乡规民约、民俗民风和道德规范等土办法。王朝政策和土办法之间相互协调配合,在纠纷调解、利益分配、林地资源流转等领域共同发挥作用,为木材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一套严密的社会控制系统,保证了木材市场的基本秩序,规约了清水江流域林木贸易的秩序,维护了该流域内良好的生态环境。

一方面,王朝政策确保了三寨轮流值开行当江的制度,三寨获得了大量利润。然而,围绕市场管理权的控制以及要求共分利益的纠纷也就时常发生,由此导致的官司不断,尤其是天柱县的垵处与三寨的当江之争最为突出<sup>②</sup>。对地方纠纷,中央政府以口谕、诉状和布告等形式进行积极介入,贵州巡抚晓谕,“该处苗汉人等,勿许再有觊觎争夺,私于向例之外,多索分文,致有病情弊。而商等亦不得听口改规,借口之税误,令自干罪究”<sup>③</sup>。同时,随着木材的大量采集,尽管有人工林作为强大的生产补给线,但木材市场难免陷入空虚状态,因此,官府十分重视苗木的生产,开始对种植环节实施一定程度的干预。官府规定,“不得放任牲畜践踏,不得在植林地带烧山积肥。违者,官府将根据林主报告,均令照数追赔”<sup>④</sup>。道光四年(1824),贵州按察使宋如林在劝民种树养蚕中明示,“其有无赖之徒盗伐他人树木,有犯必罚”<sup>⑤</sup>。国家的积极干预为木材贸易提供了坚实的正式制度基础。

另一方面,土政策指的是苗侗人民内部达成的一种协议和形成的一种惯习,主要有签订契约、立碑文和制定乡规民约等。契约指的是清水江文书<sup>⑥</sup>中关于林木贸易方面的内容,至今保存完好。当地人讲诚信,一般不会违反契约的规定,外来木商在这里极少受到坑蒙拐骗。“中国苗侗民族混农林文书,是苗、侗等民族民众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混农林生产、人工营林、木材贸易等地方性生存智慧的集中反映”<sup>⑦</sup>。契约分为红契和白契,前者指的是需要盖有官府红色印章,目的是为了获得官衙认可。后者指的是不需要官方认可,属于民间主导,双方协商达成,并有中间人担保的协议。在长期种

① 贵州省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侗族社会历史调查》(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

② 由于木材交易带来的大量利润,不少地方开始争取利益。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垵处与茅坪、卦治、王寨的当江权力的争夺,最后以垵处失败告终。

③ 贵州省编辑组:《侗族社会历史调查》,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47页。

④ 罗洪洋:《清代地方政府对黔东南苗区人工林业的规范》,《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

⑤ 任可澄、杨恩元:《贵州通志·前事志》第3册,刘显世、谷正伦修,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点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4-445页。

⑥ 清水江文书的内容主要包括山场买卖和租赁,山林纠纷调节和诉讼,乡规民约,还包括钱粮借贷、婚姻、家族分家和祭祀等。

⑦ Long Yuxiao (2008). Memory of the Globally Important Agro—forestry Tradition: Archiving the Jinping Manuscripts as In—digenous Documentary Heritage in China. The 16th ICA Congress, Kuala Lumpur, Malaysia, July 2008.

植和贸易过程中,地方族群之间、地方族群与外来人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契约文化,“张应强、王宗勋编《清水江文书》收录 6378 件的契约文书中,红契只占 424 件,就是 6.65%”<sup>①</sup>。

乾隆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姜凤章卖山约立卖山人上寨六房姜凤章,为因手中空乏,自己问到富宇名下将山出卖,地名过河□故□,当日凭中议定价银一两三钱正。其山自卖之后任从富宇照契管业,日后不得异言争论。如有来路不明,俱在卖主理落,不与买主相干。恐后无凭,此约永远存照。此山作两大股,分作六小股,此今得买凤章一股。

卖主 姜凤章

代书 姜得中 银五

乾隆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立<sup>②</sup>

“碑刻,即在碑碣、石壁上刻写、雕镌有文字、图案或宗教造像等,赋予其文化信息的石质载体谓之碑刻,或称‘石刻’”<sup>③</sup>。清水江下游地区自清朝以来便大兴刊碑之风,说明碑刻与木材贸易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碑刻是木材贸易繁荣的产物,只有在繁忙的木材贸易中出现纠纷等特殊事件时,碑刻才会产生,另一方面,碑刻的产生又在很大程度上确保木材贸易的顺利进行,从而为木材贸易奠定了较为坚实的非正式制度基础。该流域下游地区的碑刻数量众多,“目前为止,仅天柱县笔者就已经收集到了 269 通”<sup>④</sup>。以下是锦屏县卦治的石契,名为《奕世永遵》,对山贩和木商在江面上的界限给予了明确的说明,这可以被看成是便于木材运输和交易的一条规则,其内容如下:

“此处界碑以上,永为山贩湾泊木植,下河买客不得停篙。谨为永遵,毋得紊占”<sup>⑤</sup>。

就民俗而言,杨公文化、民间谚语、乡规民约和乡绅的调节等同样促进了树木的保护和木材的贸易。杨公文化指的是对杨五(武)的信仰,杨公是一位水神,专门管理清水江一带,在江边有杨公庙,被赋予河神般的镇邪保平安的威力。杨公文化是木材贸易的产物,同时反过来又促进了木材贸易的发展。清水江上游到处是激流险滩和暗礁,风险很大,“以其赏寄一线于洪涛巨浪中”<sup>⑥</sup>,人们将过往江面的装有木材的排船的安全寄予在杨公身上,增加了运输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木材的流通。此外,在木材纠纷调解方面,杨公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当遇到难解决的纠纷时,双方就会到杨公处进行调解,一经杨公调节,双方必定心服口服,因此,杨公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木材贸易的发展和繁荣。林木谚语鼓励种树及对破坏树木的惩罚,如“春宜栽杉,秋宜伐杉”、“家栽千苑杉,孙子享荣华;家有千株桐,一世不受穷”<sup>⑦</sup>等也在无形中维持着一个繁荣的交易市场。同样,如果有人不遵守地方性规矩的话,寨老或乡绅就会出面主持公道,并立下契约,况且,清乾隆曾有规定,“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迥别;嗣后苗众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sup>⑧</sup>。以下是文斗寨大汉王子元年(1911)二十八日的一份契约,白号是由姜登鳌祖上遗留下来的,因在出售过程中出错导致矛盾产生,

① 刘亚男,吴才茂:《从契约文书看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伦理经济》,《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2 年第 2 期。

② 陈金全,杜万华:《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4 页。

③ 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9 年,第 7 页。

④ 李斌,吴才茂,姜明:《论明清以来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碑刻的分类、内容与学术价值》,《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3 期。

⑤ 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第 68 页。

⑥ 乾隆《婺源县志》卷 4。

⑦ 《侗款》,岳麓书社,1988 年,第 89-90 页。

⑧ 《清高宗实录》卷 22,乾隆元年七月壬寅。



最后凭团绅出面协调,事情得以解决,如下:

“立错字人岩湾寨范炳魁、范基茂为因错卖下文斗姜登鳌弟兄祖遗山场杉木一块,土名白号。其山界址:上凭埂路,下凭小盘路,左凭冲以黄闷山为界,右凭冲,四抵分清。凭中自错之后,任凭登鳌照契管业,口说无凭,立此错字为据是实”。

凭团绅范炳清、姜为耀、范锡章

基茂亲押

大汉王子元年二十八日魁笔立<sup>①</sup>

此外,侗族的款约<sup>②</sup>和苗族的议榔<sup>③</sup>等乡规民约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侗款》中的部分内容:

“山坡树林,按界管理,不许过界挖土,越界砍树……说道山头坡岭,田土相依,牛马相聚,山林地界,彼此相依。山场有界石,款区有界碑,山脚留火路,村村守界规。不许任何人,砍别人的树林,谋别人的财物”。<sup>④</sup>

总之,王朝的法令和制度与关于山林买卖秩序的林业文书、习俗禁忌、碑文等土地办法相互补充,围绕林业种植和交易行为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社会控制规则体系,规约了林木贸易的基本秩序,从而为清水江流域木材的长久贸易奠定了较好的制度基础。

综上,清水江木材的交易量在清时代达至顶峰,缔造出木材贸易的黄金时代,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归纳如下:适宜林木生长的地域环境及天然的运输水道是该流域木材贸易的前提和基础;清朝疆土的深度拓展和“皇木”身份的确认奠定了苗木较高的价值,是木材贸易至关重要的因素;木材区域性市场网络塑造出良好的交易秩序,是木材贸易的市场驱动力;人口急剧增加背景下苗侗族群寻求的另类生计模式所开辟的人工林规避了天然林带来的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使得木材的市场交易得以顺利进行;基于国家法令和法规的王朝政策和基于地方的契约、风俗习惯和文化等土办法对木材生产和贸易进行共管共治,为木材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上述五个方面基本说明了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繁荣的原因。然而,本研究并未穷尽所有,期待后续研究能在深度和广度上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 [参 考 文 献]

- [1] 贵州省编辑组. 侗族社会历史调查[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
- [2] 张应强. 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 [3] 李斌、吴才茂、姜明. 论明清以来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碑刻的分类、内容与学术价值[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3).
- [4] [清]爱必达. 黔南识略[M]. 杜文铎,点校.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① 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7页。

② 款约指的是侗族族群内部认可和制定的关于纠纷解决、协调关系、维护村寨等的条文条款,是侗族的习惯法,一旦制定,大家皆按照规定办事。

③ 议榔是苗族人共同商议而制定的规约,是苗族的习惯法,人人都遵守。

④ 《清高宗实录》卷22,乾隆元年七月壬寅,第89-90页。